

马汉的幽灵 仍在徘徊

原作〔美〕詹姆斯·霍尔姆斯 吉原俊井 译 / 刘怡

(原文载美国海军学院学报《Proceedings》2009年第12期)



作者简介：詹姆斯·理查德·霍尔姆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USNWC）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学与政策问题。海湾战争期间服役于“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后在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取得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协会、能源安全协会和佐治亚大学担任过多年的研究工作，重点关注亚洲海权尤其是中国军事问题。近年来，霍尔姆斯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有见地的论文，其言论曾被中美两国媒体广泛引用，在美国政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代表作《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海上战略的挑战》获颁《大西洋月刊》2010年度最佳图书奖及美国海军学会2010年度杰出海军图书奖。

吉原俊井为霍尔姆斯的长期合作者，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约翰·范布伦亚洲-太平洋研究教席副教授。

时至今日，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所倡导的海权逻辑和行动“语法”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一如他关于主力舰和大舰队作战的学说曾经在19世纪发挥过重要影响。

美国海权的前景取决于美国海军是否得以保持快速介入东亚的能力，后一地区已然成为美国海上行动最为频仍的两大区域之一。另一中心海区自然是印度洋-波斯湾，不过它远在南亚和西南亚海岸之外。当前，美国的战略目光将集中于亚洲海域（参见

2007年10月发表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报告）。开支自是与日俱增，不过海军采购预算却不见上涨。这样一来，舰队规模不可避免地受到缩水的压力。而一线部队是否有能力实施2007年版海上战略也越发受到怀疑。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最具可能的假想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却走在一条相反的道路上。中国海军正以新型战舰、潜艇和飞机

武装自己。虽说没人会臆断单凭这些装备就足以使中国获得一对一抗衡美国海军的能力，但中国舰队有其先天的优势：它只须专注于亚洲，而美国海军却要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义务。华盛顿不可能将其绝大部分军事力量集中在单一地区——即使该地区至关重要。而中国在关键节点上的数量优势，以及它毗邻这一地区的优越地理位置，无疑意义深远。

不仅如此，据报道已经处于生产阶段的中国反舰弹道导弹（ASBM）



将整个地改变游戏规则。借助这一利器，中国海军在涉及周边亚洲国家的问题上得以进一步实现其目标，而美国却被隔绝在这一防区之外——中国 ASBM 的射程据称高达 2500 千米，这意味着倘若美国舰队越过北起日本、南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二岛链，就有可能遭到打击。ASBM 的攻击——甚至仅仅只需存在这类攻击的威胁——便足以吓阻远道而来的美国舰队，使他们不敢冒险深入这一海区；倘若后者一意孤行，必将引发严重事态。藉此一着，中国海军将使美国这一强大对手无法踏足黄海、东海、南海等周边海域，并尝试夺取制海权。

关于介入问题，当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行动、战术和兵力结构的层次。这一状况是可以理解的。倘若中国欲将美国锁闭于其周边海域之外，他们可以采用的最直接和最为引人注目的策略便是“反介入战略”（Anti-access Strategy）。对美国人来说，美国海军航母特混舰队上一次置身于覆灭的危险中已经是二战时期的事了，“尼米兹”级航母熊熊燃烧的情景想必会唤起他们的这段记忆。对此种前景的恐惧也使得人们的全部思绪均关注于此。

自行行动的立场观之，“介入”意味着排除顽强抵抗，强行将力量投送至某一区域的能力。而兰德公司在 2007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深入龙潭：中国的‘反介入’战略及其对美国的意义》中，曾将中国的“反介入”战略描述为综合运用一切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延迟美国及其盟军抵达战区的时间，阻滞或断绝该力量使用本地区基地的可能，并使敌方之力量投射工具（如航母）尽可能远离战区。这显然是对“反介入”的操作性定义，它展示了中国将如何阻止对手介入其近海“争夺区”（Contested Zone），并独占中心国家在开发海洋资源、人力以及其他方面利益时的有利条件。

简而言之，这一富于想象力的战略可以使北京获得在远离美国本土之

所对抗美国军队的能力，尽管中国海军仍然只是一支二等力量，但这对对抗的整体结果并无影响。轻易介入东亚对美国来说已经不是那么想当然了。

“超越台湾”的海上战略

西方评论在提及中国所拥有的防止外部势力介入亚洲海域——尤其是毗邻台湾的水域和空域——的能力时，基调都颇为阴郁。分析家如托马斯·艾哈德（退役空军上校，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特别助理）和罗伯特·沃克（现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对台湾这个孤岛的命运给予了密切关注。2008 年，沃克在他和艾哈德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美国知名国防智库）起草的报告《航程、续航力、隐蔽性与网络化：舰载无人战斗系统实例》中预言：“美国航母战斗群很快就将面对一种打击半径比航母更远的陆基武器（指 ASBM——译者注）的威胁，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这还是头一遭，就是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上也不过是第二次。”

或而言之，两位分析家都认为今日中国的威胁可与昔日的苏联及日本相提并论，后两个国家是此前仅有的曾在远东水域挑战过美国的敌手。罗伯特·罗斯（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一度宣称美国海军是无可匹敌的，现在就连他也对美国防御台湾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显然会注意到这些警告，可以想见，他们会把中国的海上力量完全置于“在台湾海峡实行军事反介入”这一目的下加以考察。

倘真如此，美国就误读了中国的战略。假设北京确实正在强化旨在使台湾回归大陆的反介入能力，则他们是否有能力阻止华盛顿重演 1995 - 1996 年台海危机中干预海峡的行动显然是检验这一反介入战略的试金石。目睹克林顿政府派出 2 个航母战斗群驶往台湾海外，而解放军对此完全无能为力——甚至未能提前侦察到这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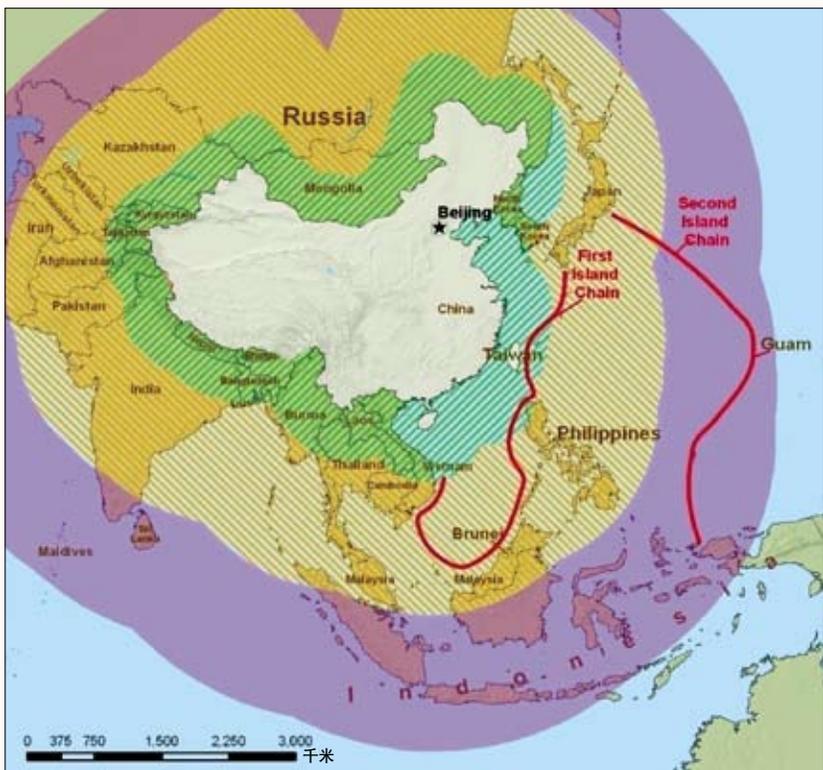


■ 克劳塞维茨最早提出“战争语法”与“战争逻辑”的区分。前者专指战争的操作层面，后者则指代他所强调的政治交往活动——战争的根源。本文作者即依据此思路，将马汉海权理论重新划分为“马氏逻辑”和“马氏语法”两个层次。

干涉力量——的历史后，中国领导人在事实上宣称：绝不允许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如果中国的意图仅仅是将五星红旗插上台湾，那么一旦台湾已经被置于牢固的控制之下，北京大概就会减少在海上事务方面的努力。到那时，中国将没有多少理由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发展海军力量上，他们将继续全神贯注地投入经济建设——这才是北京最关注的领域。“（解放）台湾之后”，中国已经光复了其最后一块丧失的领土，扬眉吐气，这个心满意足的国家随后将会转向内部。

在那种情况下，美国无从选择，只能默认台湾海峡形成新秩序。往好处想，亚洲也许将回归到中国-美国脆弱平衡的状态，前者是该地区最重要的陆上力量，后者则拥有支配性的海上力量。在这样一组平衡中，没有哪一方可以克制对手的相对地缘战略优势；也没有哪一方企图做出这种尝试。中美两国将重新开始稳定共处，而美国海军自 1945 年以来一直在维持的自由航行体制，也会在未知的将来继续存在——继续造福美国和亚洲国家。只有一小股人的处境会比之前明显恶化，那就是“台独”分子。



■美国发布的《2010年中国军力报告》中有关中国若干型导弹射程的示意图，其中黄色斜线区域就是美国认为反舰弹道导弹的覆盖范围，虽然它还是传统的以陆制海方式，但其射程已经足以覆盖第二岛链之内的大部分区域。

不过，这样一种良性后果并非必然发生，甚至很难说是大有希望的。例如，今日的中国经济依赖于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自然资源。如何才能确保经印度洋运输油气资源来华的商船沿途的航行安全已经开始困扰北京。这显然是一项非海军莫属的任务，而商业利益将驱使中国海军不甘固步自封、继续取得发展，不管北京已经多么顺利地解决了台海僵局。以此观之，商业利益之于中国国家战略的价值，自当超过收复台湾的小小目标。

万夫莫敌 (Invincible), 抑或人畜无害 (Inoffensive) ?

有鉴于此，相当一部分评论人士对台湾问题苦恼不堪。而单纯从军事角度解释中国崛起的事实，又使西方人的视野进一步狭隘化，并且影响到了他们推测中国海上战略将如何发展、西方又当如何应对的能力。这些观察家毫无疑问地确信，中国正在积

累在“后统一时代”投射力量的手段。而北京正在发展的用以支持其“反介入战略”的军事装备则是一个信号，它代表中国有意长期在亚洲水域保持其存在。

不过，装备方面的动向并不代表一切。北京将如何确立其外海存在依然是一个疑问。我们可以断言，今日的中国还不是某个大洋的主宰者，它并不像某些分析家所宣称的那样，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海域。不过，它也不像北京所自称的那样是一个全然和平的强国，它的邻国对它依然存有恐惧。不同的评论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趋于两极化，有的把中国描述得气势汹汹、万夫莫敌，有的则认为它温顺驯良、人畜无害。站在海军专业人士的角度，笔者认为较合理的揣测是中国未来的走向应当处在这两极之间。

对亚洲军力平衡的执念不仅歪曲了西方对中国海军前景的评估，也使他们对介入问题的研究难以为继。军

事领域的反介入尽管至关重要，但它仅仅是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深远而持久的挑战——以贸易、商业和政治利益为基础的挑战——中的一个单一部分。美国的分析人士以及亚洲事务运作者必须拓宽他们关于介入问题的视野，超越单纯军事力量的运用，引入非军事准则。

他们也必须承认，反介入战略对双方都是各有利弊的。如果美国担心自己会被闭锁于亚洲海域之外，那么中国的战略家也会抱有类似的疑惧。他们担心美国海军可能实施报复性的反介入战略，锁闭对中国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外围海上航道。在中国人看来，打破当下这种变相遏制需要北京在局部水域长期保持海军存在，而那将是他们在解放台湾之后才需考虑的问题。至于目前，介入或曰通道问题依旧构成中国——以及美国——海上战略的原动力。

马汉与克劳塞维茨

在探究中国的海上崛起一事上，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在他看来，海洋代表了一片“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有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第一章）。“交通”，或曰海洋公有地上的安全通道，乃是“政治或军事战略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亚洲问题》第三章）。马汉宣称，一国“海权（可取的）显赫地位”取决于对关键海上航道和地理据点——诸如岛屿和沿海港口——的控制（《美国海上权益之今昔与展望》）。港口的意义在于，从那里出发的战舰可以相机对海上交通进行保护或阻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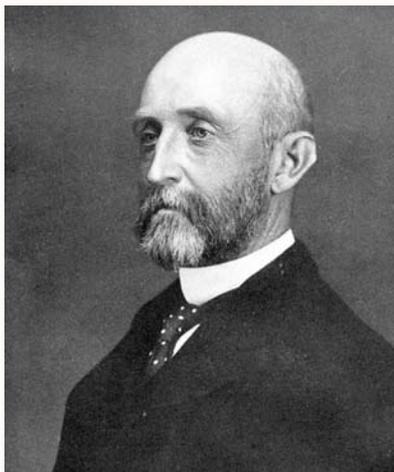
事实上，借助海军行动阻断一国的海上交通乃是在直接打击该国国家活力的“源泉”（《亚洲问题》第三章）。不过在马汉看来，这种打击的形式绝不仅仅限于军事意义上的海战。在此问题上，他的理论具有双重倾向。而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只不过是政治



交往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这一观点有助于阐明海权理论的双重性质。克氏驳斥了习见的认为国家间非暴力交往也随战争爆发而中断的观点，他宣称：“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

在以上的言说中，克劳塞维茨提及了两个与“介入”相关的要点。首先，战争是以军事手段追求国家政策目标的活动。它在性质上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外交和商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或然性及不确定性，同时还催生盲目的激情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其次，交战国之间的政治互动并不因战端开启而告中止。即使是在战时，诸如在外交、经济领域的施压或利诱这类非军事手段依然能发挥一定作用。

现在，让我们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海权。时至今日，将马汉的学说仅仅等同于战列舰和大舰队作战——简而言之，海军战术以及舰艇设计——已



■ 1902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时的马汉。通过对历史的详尽叙述，他将前人有关海权的分散理念综合为一套逻辑严密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海权的若干具有根本性质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原则。不过世人往往忽视“马氏逻辑”关于平时时期海权建设以及海权-经济关系的叙述，而单单关注“马氏语法”中的主力舰决战一隅。

属司空见惯，人们乐于将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2009年9月，海岸警卫队的R·B·瓦茨上校曾在《美国海军学会会报》上发表题为“海权的终结”的文章，他的言论即代表了这一派的典型观点：战列舰已成明日黄花，思想领域的进步则日新月异；在1944年莱特湾海战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舰队作战，因此，马汉式理论已经无用武之地。这种看法显然失之粗浅。马汉关于海权的逻辑为海上战斗的语法提供了意义。忽视这一点将限制并扭曲我们对海权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无从洞悉马汉式理论所具有的恒常价值。

马汉并不汲汲于追求海上交战。他宣称，“军事或政治力量”乃是一种“异质因素”，它在国家事务中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插入者（《亚洲问题》第一章）。诚然，马汉曾怂恿海军指挥官在战争不可避免时采取进攻态势，但他从未赞成海军自行其是地进行对抗。用今天的话来说，马汉督促政府在军事对抗上采取“对冲”（Hedge）策略，在舰队交战问题上保持开放心态。但他在另一问题上则比克劳塞维茨更进一步，即马汉不仅将其学说的逻辑/语法建构在战场背景下，而且超越了战争状态，使其深入到和平时期的外交领域。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的绪论中，马汉将海军战略与军事战略区分开来，他认为，海军战略意在“建立、维护和不断发展本国的海权，无论其时为和平抑或战时”。获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据点——即马汉的知己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优势点”（Points of Vantage）——乃是在平时时期支撑海权的途径之一，努力获取前往主要市场和基地的通道（介入能力）亦是如此。海洋国家永远是处于攻势的，这一点并不因战时或平时而稍有更易。就像德国海军中将沃尔夫冈·魏格纳在1929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中所抱怨的那样：大不列颠

在连续几个世纪里都处于战略攻势，这使其得以成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上帝国（关于魏格纳其人及其学说，《现代舰船》近期将有专文加以介绍——编者注）。

切实之道

海军军备无疑是海上战略所仰仗的利刃，不过它也仅仅是实现此目标的可用手段之一。在马汉看来，商业才是增进一国财富、提升国家实力的切实之道：“战争已不再是一国不可避免的命运，甚至也不是可取的常态，军事方面的考虑不过是它们所侍奉的其他更加重大的利益的区区附着物和垫脚石”（《回顾与展望：国际关系的海军及政治研究》）。经济繁荣被他置于了优先地位。理解海权的“起点和基础”乃是“保护商业的必要性，这种保护将借助有利于军事或海军实力发展的政治策略来实现。对一个国家来说，以下三种要素按照其事实上的相对重要性应该如此排列：首先是商业，其次是政治，最后才是军事”（《回顾与展望》）。

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国都热衷于插足像亚洲这样一个遥远的地区。就其本质而言，商业意味着无拘束地获取令财富和国家权势增殖的手段。倘若没有军事手段作为保护，或者缺少逐退意在禁绝这种盈利能力的假想敌的手段，则商业自由或者说可靠的通道将成为不可能。有鉴于此，马汉提出了一个三段式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其海权理论的第一支“三叉戟”，或曰“马氏逻辑”。在这杆马汉式“三叉戟”当中，经济福祉的源泉——对外贸易、商业和自然资源——的介入能力或曰通道排在第一位，军事介入能力排第三。这与流俗意见通常所认为的马汉以军事考量为中心的观点大相径庭。

海权理论发挥作用的第二个维度，或曰“马氏语法”，在性质上则更加偏向军事和行动。马汉这位历史学家在他

一战末期的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也是马汉所认为的决定性会战工具。本文作者认为，尽管马汉关于主力舰和大舰队作战的教条已经过时，他的基本逻辑和行动方略对 21 世纪的中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第一章中宣称，海权的基础乃是生产、商业、海运、海外市场 and 基地。这便是他的第二支“三叉戟”。不过即便是在此处，马汉依然将商业置于优先地位，随后才着力探索保护自由通商的手段。

的确，马汉第二支“三叉戟”的 3 个尖齿无一例外地与商业紧密相关，它们就是工业生产、商船队和国外市场。马氏特别指出，“喜好贸易、包括不可避免地生产某些用于交易的产品倾向……乃是对发展一国海权最为重要的民族性”（《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第一章）。另外两个要素则与海军直接相关，那便是前进基地和战斗舰队本身。不过，贸易与商业构成了以上“马氏语法”与“马氏逻辑”之间的主要衔接点。

由此可见，“马氏逻辑”驱动着政府为商业目的而寻求通道；“马氏语法”则意味着借助军事力量支撑这一通道。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第二章的结尾，马汉宣称“控制海洋”意味着“在海上拥有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力量，将敌人的旗帜逐出公海，或者只允许其作为逃亡者出现；借助对主要海区的控制，锁闭前往敌方海岸、或者自敌方海岸出发的一切商业航线”。这种压倒性力量将以战舰、

舰载武器和作战效率为载体得到实现，它们构成军事性的“马氏语法”的具体化。

为圆满达成其目标，“马氏逻辑”和“马氏语法”这两支“三叉戟”都必须保持锋利。两者都需要确保使用

诸如港口、基地等位置的通道（或曰快速介入能力），以及获得贸易品、自然资源等有形商品的机会。两支“三叉戟”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不过“马氏逻辑”支配的是海权的地理政治和战略特征，“马氏语法”则为海军军备和海战提供准则。

倘若以马汉式术语加以界定，所谓“介入”（Access，亦可作“通道”解）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既包含了经济和政治的“马氏逻辑”成分，又与军事的“马氏语法”相关。将介入问题仅仅局限在台湾纠葛一隅的观点无疑误判了中国海权的逻辑，它低估了中国经济对来自中东和非洲、经海运输入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将建构介入能力的工作完全当作强化军事介入能力则是另一种歧见，它拒斥了海权背后的基本动力。倘若战略家们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事情的某个方面，他们很容易就会制定出有缺陷的政策及战略建议。

不仅如此，“通道”甚至也不单是美国一国的特权，后者意味着美国拥

有在亚洲海岸投射其军事力量的绝对自由。中国领导人及其将领们焦虑地宣称，鉴于华盛顿自认为在某些海域受到中国的挑战，美国将部署强大的海军力量以阻止中国获得前往公海的通道。中国人正为其经济活力、国家实力和国际声望在经济、军事两方面做出重要努力，在他们看来，确保拥有穿越公海的行动自由对这种努力具有核心价值。

仍具现实意义

尽管马汉关于主力舰和大舰队作战的教条已经过时，他的基本逻辑和行动方略对 21 世纪的中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一如其在 19 世纪曾经深深影响过美国。美国海军也仍旧可以向他们这位睿智的前辈寻求帮助，以更好地解读中国海军的发展，并使本国的海军战略与新形势相契合。鉴于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专注于经济发展、富于进取心的国家，北京必将挥舞起马汉的那两支“三叉戟”来。至于台湾僵局的解决，则只会使中国得以将其全部注意力转移到本国在亚洲其他水域的利益上来。

如果华盛顿足够明智，他们也会从类似的角度检视自己的战略，接受中国代表了一类恒常的复杂因素这一事实——不管中美海上关系最终将走向合作、对抗还是中立。而马汉的幽灵，也必将因他的著作仍在发挥持久作用而微微一笑。✍

中国人正为其经济活力、国家实力和国际声望在经济、军事两方面做出重要努力，在他们看来，确保拥有穿越公海的行动自由对这种努力具有核心价值。



对话詹姆斯·霍尔姆斯

本刊特约记者 / 刘怡

如果留意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媒体，会发现“中国海权的发展”是个关注度非常高的话题，如果讨论这个话题，那么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霍尔姆斯先生的言论就绝不可忽视，他的观点在美国政学两界都具有较大影响力，但中国读者对霍尔姆斯则相对陌生。《现代舰船》邀请刘怡先生作为特约记者与霍尔姆斯博士就反舰弹道导弹、反介入战略以及海权论对中国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对话，以下就是对话内容。

刘：《现代舰船》特约记者刘怡，霍：霍尔姆斯博士。

刘：尊敬的博士，我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不少分析人士对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系统（ASBM）产生了浓厚兴趣。您在文中曾经提及，ASBM可能“整个的改变游戏规则”，并构成所谓“反介入战略”的重要工具。那么依您的看法，ASBM究竟已然是一种有效的打击手段，还是更像一个“图腾”或者象征物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远在19世纪80年代，防护巡洋舰、撞角和鱼雷的兴起也曾为对抗铁甲舰提供过不少新手段，但其后40年里，这些新技术从未能催生出一套足以取代主力舰中心战略的全新海上战略（奥贝海军上将和他的“青年学派”大概除外，不

过那显然属于异端）。至于ASBM本身，到目前为止，它的攻击精度和前期侦察网络——如卫星、预警机、远程雷达等——还处在相对简陋的阶段。因此，我不认为ASBM可以充任反介入战略的支柱。您在文中的观点似乎也是如此，可否请您作进一步的说明？

霍：我的看法和你接近。从技术角度说，我本人对ASBM一直持不可知论观点。在文章和论述中提及ASBM以及“要塞舰队”概念（Fortress-fleet，这是我本人首创的一个概念）时，我总是以“倘若ASBM的真实战斗力与其宣传相一致，那么……”作为开头，随后才对

其潜在的威慑力作出评论。

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假如单单将ASBM视作图腾，那也是一种过火的做法。在19世纪后半叶，你所提及的防护巡洋舰、撞角、鱼雷这些武器本来是有可能造成某种战略上的变化的，但当时的海军似乎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应当严肃看待这些武器，以及在重视的前提下又应当如何运用它们。即使是像朱利安·考贝特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承认，他对鱼雷的作用不甚明了——如果配备鱼雷的小型舰艇也可以对主力舰队构成威胁，再将大舰巨炮时代的史实奉作圭臬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可能就与之相仿。不仅如此，爱德华·勒特韦克（当



霍尔姆斯认为，将中国未来的航母编队和美国航母编队相比较是误入歧途。因为如果反舰弹道导弹这类远程保护伞可以奏效，那么中国航母编队就可在其配合下执行任务，如此一来，和美国航母形成数量-质量上的绝对均衡就没有必要了。

漫步 摄

代知名战略学者)也教导我们,海军武备在和平时期的竞争中亦可产生战略层面的影响——他乐于指出,苏联海军建造了不少外观“生猛”的军舰,它们在战斗力上未必能和美国的同类舰艇相抗衡,不过在外行的公众眼里,这些“生猛”的舰艇显然足以与对手等量齐观。

刘:让我们谈谈“反介入战略”吧。依我的看法,它与较早时的“岛链战略”,或者“背靠大陆、控制海洋”的路线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对海军史研究者来说,后者尤其不陌生,拿破仑和苏联人都打过类似的算盘。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意大利海军在1940年就曾在地中海地区推行过反介入战略,墨索里尼希望藉此锁闭皇家海军深入地中海的通道。但由于英国舰队依然控制着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与马耳他,意大利人完全

无法阻止坎宁安上将的舰队在几个关键据点间自由行动。此外,即使意大利人成功地达到了反介入的目标,这对他们也毫无意义,因为意大利所需的原料尤其是石油无法从地中海区域内获得,依然要从外部运入。对他们而言,反介入的“限度”显然很难把握。因此,我对您在文章第二部分的观点十分赞同。关于反介入战略之“互有利弊”,您还有新的意见吗?

霍:我同意你的意见。“反介入”在概念上显然不是什么新东西,唯一的不同在于,今天的岸基火力支援可以延伸到离岸数百英里外的目标(例如ASBM),这给实际作战带来了一些新意。倘若ASBM和其他武器可以将美国海军阻滞在中国海岸线外数百英里,中国就可以节省财力,不必建造一支规模和美国相近的舰队来与后

者进行正面对抗了。因此,当前一些评论乐于将中国未来的航母编队和美国航母编队相比较,这是误入歧途。倘若解放军航母可以在ASBM之类远程保护伞配合下执行任务,那么它们就没有必要和美国航母形成数量-质量上的绝对均衡。

刘:6年前,我曾读到罗伯特·卡普兰先生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我们将如何与中国作战》;就在去年,卡普兰先生又发表了题为《中国权势的地理学》的文章,继续鼓吹“中国正在无拘无束地建设一支大海军,未来若干年里,这将使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您的文章作为论据。在卡普兰先生眼里,“中国的陆上边界提供了更多机遇而不是挑战”,这构成北京全力发展海军的有利条件之一。不过我记得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早在1943年就曾提及,边缘地带力量

中心的生长可能招致心脏地带国家与外围海洋强国的共同打击(《和平地理学》)。在欧洲历史上,诸如拿破仑法国和威廉二世德国这样的边缘地带强国往往被心脏地带国家(俄国)和外围海权国家(英美)合力绞杀。因此我预见,华盛顿可能对新德里、莫斯科和中亚发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以便制衡北京。您对此的看法如何?

霍:你的看法言之有理。倘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国际体系具有自动调节机制,那么中国在未来可能需要对其陆上边界投以更多关注。不过,考虑到均势思想目前在华盛顿处于失势状态,我不确定美国对制衡中国的力量是否真的上心。“离岸制衡”的鼓吹者总是对我们说,美国应当“摆脱欧亚大陆(的义务)”。他们对“离岸”这部分

显然十分关注,不过对制衡就不那么上心了。

刘:资深海军史家唐纳德·舒曼教授在他的名作《大海军之养成》中曾提及,“研究18世纪战争的学者并未意识到其研究对象的性质是有限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和人口发展水平,更因为18世纪结束后,战争在总体目标上已不再有限了”。在他看来,马汉过于迷恋风帆时代的海战经验,并未彻底理解克劳塞维茨关于“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的划分。到了21世纪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颠倒:恰恰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海权的兴衰(这属于“绝对战争”或“总体战”范畴),而不是像马汉所说的,是海权和商业构成了国家经济增长的灵魂(这属于“有限战争”范畴)。中国被公认为一个大陆国家,但因为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它在生产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反而更有优势,甚至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安全阀。在这种情况下,您依然认为马汉的见解对中国的海军上将们不无裨益吗?

霍:我对马汉无疑充满敬意,不过他显然更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家,而非缜密系统的思考者。他大概没有读过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即使读了,参考的多半也是当时流传于美国的翻译极其蹩脚的英译本。因此,舒曼教授的批判是可以解释的。很明显,马汉认为商业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我在文中也提及了这一点),随后是政治,最后才是军事维度。因此,我猜想他本人的思想属于“贸易决定军力”学派,而非相反。在他看来,商业为关税之父,税收为海军之父,海军反过来又能为商船队提供保护。

刘:今天,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和普通大众对马汉的名字以及“海权”这个词汇已经相当熟悉了。不过,自1985年以来,马汉的著作只有3



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海军战略：其与陆上作战原则及实践之比较对照》以及《亚洲问题》被翻译成中文。除此以外，中国的军事爱好者和研究者们对科隆布兄弟、朱利安·考贝特或赫伯特·里奇蒙德这些海权思想家的生平乃至著作还相当陌生。

不少人对威廉二世的德国海军以及曾经的苏联海军抱有更加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两者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偶然；至于马汉或者美国海权建设的经验，部分已经过时，部分也无甚新鲜。有人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国家，

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它既不会走上苏联的老路，又不必照搬美国的经验，而是可以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海权之路。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霍：我认为这类看法既对又不对。在一个问题上，我和中国的年轻人们看法一致：马汉关于海战的的克劳塞维茨式“语法”至少部分已经过时了。当然了，“制海权”依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马汉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在今天依旧引人注目——关于主力舰的定义，关于一支独立的分舰队究竟应当具备多大实力的经验法则，等等。至于说他关于国家目的的“逻辑”，我认为，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和

受关注程度与马汉本人在世时可谓不相上下。另外，不久之前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国学者正在关注考贝特，我们也翻译了中国学者关于考贝特研究的文章。

刘：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对《现代舰船》的读者以及我本人的赐教。也希望能在合适的时间邀请您到中国访学座谈。

霍：因为工作进度的关系，我对你的见解只能给出十分简短的回复，希望能有帮助。中国之行对我而言很有吸引力，我对此深怀期待。✍️（编辑/崔轶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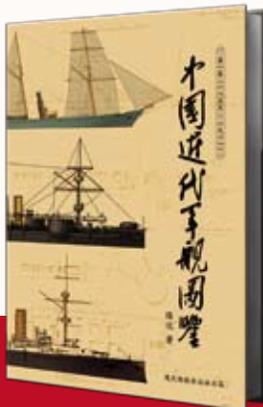
中国有航母了！

针对这一好消息，《现代舰船》杂志社第一时间推出了纪念版的中国航母——“瓦良格”号图案T恤衫！

本T恤衫采用220克精梳纯棉制造，图案采用最流行的热转印，具有高品质高保障，T恤的图案采用现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为背景，画面生动优美，极具时代意义！本次共推出三种颜色：红、黑、白，每种图案基本都有三种颜色，三种尺码，必有一款适合您。

原价80元，现八折优惠64元，100件以上可批发，详情请具体咨询，若店主不在可直接留言，看到必复！

购买地址：现代舰船淘宝店（<http://shop64454263.taobao.com>）/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现代舰船》杂志社 欧阳菲收



现代舰船杂志社 2011 年增刊

《中国近代军舰图鉴》上市预告

《中国近代军舰图鉴》系陈悦先生耗时数年，对中国近代海军诸种装备所做的系统梳理，本书按时间顺序将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历程分为创设海防尝试期、同光新政时期以及清末新建海军时期3个时期，分章节详尽介绍了不同时期中国海军所有作战舰艇的性能及服役简史，并配有详细的彩色线图和照片，其中大量历史照片系首次曝光。此外，陈悦先生还特别撰文从舰型、舰体、装甲、动力、武装等方面分析这一时期舰艇技术的演变，并对中国近代军舰的涂装和海军旗帜进行了详细梳理。

中国近代军舰彩色线图全谱首次刊登全文 226 页，定价 25 元

无论对于海军史爱好者还是对于专业研究者，这本书都是极好的工具书，堪称中国近代军舰的“简氏年鉴”。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现代舰船》杂志社 欧阳菲收 邮编：100192 咨询电话：010-64831783-800-808